

推进治理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

任勇

系、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治理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也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可成为创新原点的课题。这有助于研究者跳出西方治理理论的固有视野，从一个发展中大国高效的治理实践中探索分析治理规律，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形成扎根中国土壤、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治理话语。

新时代我国治理理论研究的创新特点

新时代以来，基于全方位、深层次的治理实践，我国研究者努力摆脱原有治理理论研究的缺陷，跟随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推动治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拓展，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研究深度、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实践性增强。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注重顶层设计，也十分注重试点先行的方法，善于从基层提炼经验。这种注重实践的导向，引导研究者把目光聚焦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多彩的实践场景，比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各地数字治理探索等，从中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素材和研究议题，从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等多个维度努力进行学术建构。这推动治理理论研究突破理论与实践二分的窠臼，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中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治理理论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主要围绕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以社会秩序可持续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点关注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以及相关主体的参与和互动过程。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源于现实中行政实践、管理实践等的需要。而西方国家的治理架构、治理目标、治理运行机制等与我国存在根本差异。如果我国研究者只局限于运用西方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实践进行解释，不仅无法得出立得住脚的结论，而且长期下去就会丧失学术创新原动力。

系统性拓展。大国治理有大国的特点。我们党从整体层面谋划推进治理现代化，不零敲碎打调整，不碎片化修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整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全面深化改革伊始，我们党就统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国各有各的治理体系，但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

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把治理能力引进治理理论之中，有利于解决西方治理理论中责任归属困难、可行性和有效性差等理论困境，引导学术界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体化议题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话语。当前，从理论来源上说，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等都被融入治理理论研究之中，理论分析框架更为丰富；从研究广度上说，从党的建设、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到城市治理、乡村治理、边疆治理、全球治理等，治理理论研究更加立体和全面。治理实践的系统性促使学术界改变以往碎片化的研究倾向，努力生成相对完整的治理知识体系，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自主性提升。治理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后，学者们基于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和实践从不同方面对治理理论进行阐述。虽然以往我国学界围绕国家、社会、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等研究并形成相应理论范式，但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往往从治理的某一侧面进行探讨，更多关注国家理论、政党理论等相关领域的引介或改造，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还不够。在当前我国治理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知识、建构性知识、集成性知识不断增长并相互促进，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提升。在基础性知识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在政党、国家与政府相关研究中，更加重视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领导者，更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是实现“中国之治”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和建设成为解释我国治理活力和效能的重要视角。建构性知识基于新时代治理新实践而生成。比如基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践开展的政府职责研究，围绕“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改革的政府效能研究等，都是建构性知识产生的沃土。集成性知识综合基础性知识和建构性知识并以我国治理内在逻辑来进行演绎、归纳、提炼和总结，比如人民城市理念研究。人民城市理念超越西方的城市治理理念，以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回应了城市治理中的根本命题。作为一个综合场域，不同类型的知识可以在这一议题下互动复合，促使研究向纵深推进。

治理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议题

新时代新征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实践，继续推进治理理论研究创新，可以重点关注研究以下议题。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治理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

程，将其中国特色变为成功实践、独特优势需要付出长期努力，在此进程中也必将产生更多治理实践创新，这为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结合数字时代治理的新动向、新趋势，提炼挖掘重要议题。可以从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切入来进行理论攻关，争取实现学理性突破，形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论研究新范式。

研究制度建设和治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构建了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相互衔接的制度框架，推动国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据，治理是制度的具体落实。治理与制度建设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先立后破等制度建设原则，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的制度建设路径，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层面上，可以从制度生成、制度文化、制度执行、制度协调等方面进行探讨。推动学术界更多围绕制度建设和治理开展研究，探究制度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逻辑，揭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内在机理，把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发展的规律更深刻揭示出来。

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治理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和智慧，奠定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从传统到现代连续演化和内生性改进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内核。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无一不与国家治理有着高度的理论关联。正是这些突出特性使得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与建设方略。推进治理理论研究创新，要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注重研究文化、文明对治理的作用和影响。一旦在理论上实现两者深度结合，将有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深刻把握国家治理的文化根脉，增进国家治理的文化认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为丰沛的精神动力，为增强治理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原创性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点领域。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日益丰富，书写了“中国之治”新篇章。丰富多样的治理实践、卓有成效的治理成果，给我国政治学创新发展注入了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源。

治理实践推动政治学研究范式转型。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政治学研究者习惯于从书本中的理论或逻辑出发，或是停留于静态的制度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中出现事实不清和事理不明等问题，也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新时代，我国治理实践全面展开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推动研究者基于问题导向走向治理“现场”，思考和研究实践中鲜活的治理案例及其背后的机理，由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政治学研究范式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的领导制度明确为我国根本领导制度，从制度层面上确保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始终将党的领导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基于中国特有的治理实践，研究者日渐认识到欧美政治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国家—社会”相关理论的局限性，更加重视“党在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这一视角，进行更富解释力的理论分析，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治理实践拓展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方位实践，形成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全面构建，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提升。这为政治学研究开辟出一系列新领域、提供了一系列新议题，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也得到极大拓展。比如，党建引领的治理过程的全面展开，推动研究者对党建议题的关注和对党史的深入研究；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推动研究者对党内法规、纪检监察体制等的深入研究；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深实践，推动研究者对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深入研究；边疆治理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新实践，推动研究者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的深入研究。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日益成为重要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呈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态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深入全面研究，建构认识世界、融通中外的知识体系。这推动了研究者对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拓展了比较政治、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研究视野，从而全面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治理实践助推政治学话语自主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话语体系建构中，最为关键的是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解释力的新概念，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形成概念体系和理论表述。我国各领域各层次的治理实践，是产生新概念和新表述的沃土。比如，新时代我们党提出的自我革命，丰富了政党理论和权力监督制约理论；国家治理领域中的党建引领，丰富了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丰富了治理主体的治理概念。在基层治理和地方治理的丰富实践中，“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重要表述也助推我国政治学研究概念更新。另外，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等新阐发、新表述，从概念和表述上丰富着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概念是话语和理论的基石，话语和理论是概念间关系的建构。正是我国治理实践中产生的新概念和新表述，推动研究者积极进行自主的话语和理论建构，为增强政治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治理实践给政治学创新发展注入动力

刘伟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ZHONG GUO TE SE ZHE XUE SHE HUI KE XUE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把治理现代化作为重要命题进行深入研究，我国治理理论研究取得诸多新成果。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基于新时代新实践的治理理论研究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和广阔创新前景，将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为治理理论研究创新提供丰富资源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诸多新进展、新突破和新成就，构成了新时代治理理论研究创新最基础、最重要的知识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理论上有许多重要创新和突破。比如，有历史层面的纵深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明确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从哪里来，坚定了人们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定力和自信；有整体层面的系统谋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布局的基本方向和根本要求；有实现路径的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法治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还有运行层面的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创造性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治理运行机制，实现治理方式和治理环节的全方位协同；等等。实践中，我们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

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付立华

用密切相关。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社会治理机制，确保党的领导覆盖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促进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确保矛盾纠纷调处既符合法律规范，又贴近群众需求，把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合理诉求解决好、智慧力量凝聚好。

回应现实需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切为了人民是“枫桥经验”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新矛盾、新挑战，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比如，当前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进入基层社区，要针对新就业形态企业用工中易发多发的矛盾隐患，以及新就业群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还要关注新就业群体在职业发展、人文关怀等方面的需求，为他们融入所在的社区和城

市搭建平台，增强其归属感、安全感。可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拓展至各类安全风险预警机制、防控机制建设中，从传统行业拓展至新业态，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中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鼓励多方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聚合社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通过共建机制，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协商，让各方围绕基层治理事务充分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形成最广泛的共识；通过共治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使不同社会主体既各尽所能、各展其长，又优势互补、良性互动；通过共享机制，确保治理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形成

不同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机制，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强化科技支撑，激发社会治理的创新活力。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能够极大激发社会治理的创新活力，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比如，通过智能安防系统，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社区中的安全隐患；通过智能交通系统，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通过线上调解小程序等，可以实现矛盾纠纷的在线受理、调解、跟踪和反馈，提高调解效率和服务质量。要进一步运用好现代科技手段，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完善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加强各类风险隐患动态监测、研判分析，提升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的风险预警、指挥调度、闭环处置能力，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出版座谈会”述要

本报记者 陈炳旭

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者围绕国史研究的职责使命、理论与方法、国史研究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等展开研讨。

与会者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为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推动国史研究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要把唯物史观贯穿国史研究工作全过程，不断提高研究

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与会者认为，朱佳木撰写的《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紧紧围绕中国当代史编研和国史学科建设进行阐述，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体现了研究者对国史研究的基础理论、学科建设、重大事件、经验总结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对于更好开展国史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信息快速